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

吴 福 祥

提要 本文基于对汉语语法演变的观察,概括出三个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语法化模式或路径,并尝试对导致这些语法化模式或路径产生的类型学动因作出初步的解释。

关键词 语法化 词汇化 语言类型学 汉语历史语法

○ 引言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可见的语言演变现象。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揭示出大量具有跨语言有效性的语法化模式和路径,显示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演变具有强烈的共性特征。(参看 Lehmann, 1995 [1982]; Heine and Reh, 1984; Heine et al, 1991;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Bybee, 1985, 1988, 1997, 2003a, 2003b; Bybee et al, 1994; Haspelmath, 1997; Croft, 2000; Heine and Kuteva, 2002;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人类语言的语法化路径为什么会呈现出跨语言一致性? Bybee (Bybee et al, 1994, Bybee, 2003b) 的解释是,这些语法化路径的“输入端”(input)是跨语言相同的,语法化机制是跨语言共有的,而且演变方向是不可逆的。她 (Bybee, 1988, 1997, 2003b; Bybee et al, 1994) 甚至强调,这些在世界语言中反复出现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背后的语法化机制体现的是人类语言的“历时共性”(diachronic universals),这种历时共性是形成人类语言“共时共性”(synchronic universals)的直接原因,因而是人类语言中真正的共性。

但是,既然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不尽相同,既然人类语言的“共时模式”(synchronic patterns)除了共性特征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变异类型,那么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和路径除了共性的一面外,也一定还存在着类型变异。不过,在迄今的语法化研究中,语言学家对语法化演变的共性特征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演变的类型特征的关注。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和语法化路径究竟有哪些类型特征,形成这些类型特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类型特征,这些问题在当前普通语言学的语法化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汉语语法演变的观察,提出三个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语法化模式或路径,并尝试对导致这些语法化模式或路径产生的类型学动因作出初步的解释。

一 关系名词的语法化模式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领属结构式中的关系名词 (relational nouns) 在人类语言中具有以下两种语法化模式:^①

(i) 关系名词 > 前置词。如英语、法语、德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泰语、Maa 语、阿拉米

^{*} 本文初稿承中国语文编辑部匿名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意。文中尚存的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语(Aramaic)等。(参看 Mallinson and Blake, 1981; Lehmann, 1995[1982], 1986; Heine and Reh, 1984; Bybee, 1988; Aristar, 1991; Heine et al, 1991; Delancey, 1994, 1997; 刘丹青, 2003)

(ii) 关系名词 > 后置词。如日语、土耳其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巴斯克语、藏语、盖丘亚语、布里亚特语等。(参看 Lehmann, 1995[1982], 1986; Aristar, 1991; Heine et al, 1991; Delancey, 1997; Bybee, 1988)

考察发现,具有“关系名词 > 前置词”语法化模式的语言,小句语序通常为“SVO”(如英语);反之,具有“关系名词 > 后置词”语法化模式的语言,小句语序通常为“SOV”(如日语)。但汉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汉语是 SVO 语言,关系名词的语法化模式则是“关系名词 > 后置词”。比如“上”、“下”、“里”、“中”在上古汉语中原本是关系名词,中古以后演变为后置词(参看刘丹青, 2003)。例如:

(1) a. 疾不可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药不至也。(《左传·成公十年》)

b. 却唤危中也大危,雪山会上亦合知。(《敦煌变文校注·太子成道吟词》)

汉语关系名词的语法化模式为什么同于 SOV 语言而异于其他 SVO 语言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汉语虽是 SVO 语言,但领属结构式的语序(“领属语 + 关系名词”)同于 SOV 语言而异于其他 SVO 语言(“关系名词 + 领属语”)。由此可见,决定关系名词两种语法化模式的句法条件是领属结构式的语序(关系名词相对于领属语是前置还是后置),即:

(2) 名词 + 领属语 > 前置词 + 名词

领属语 + 名词 > 名词 + 后置词 (Aristar, 1991: 6)

这就是说,如果“关系名词 + 领属语”结构式中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adpositions),那么该附置词一定是前置词;^②反之,如果“领属语 + 关系名词”中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那么该附置词一定是后置词。(参看 Bybee, 1988: 354; Aristar, 1991: 6; LaPolla, 2002: 224)

跟汉语这种情形完全平行的是非洲境内的埃维语(Ewe):这个语言的小句语序为 SVO,但领属结构式的语序是“领属语 + 中心语(包括关系名词)”,所以该语言中关系名词语法化的输出端(output)是后置词而非前置词。例如(引自 Heine et al, 1991):

(3) é-le xɔ á megbé (megbé(‘后面’)为关系名词)

3SG. -be house DEF behind ‘他在房子的后面。’

(4) é-no déha le xɔ megbé (megbé(‘在…后’)为后置词)

3SG-drink palm wine at house behind ‘他在房后喝了棕榈酒。’

跟汉语一样,埃维语既有前置词又有后置词;而且其前置词均来自自动词(如处所介词 le (在)来自“在”义动词 le),后置词均源于关系名词。(Heine and Reh, 1984; Heine et al., 1991: 143)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语言跟汉语一样,前置词和后置词还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体词性成分前后,组成“框式附置词”(circumpositions)结构:

(5) me-ɖi le sɔ dʒi

1SG-descend at horse on ‘我已骑在马上。’

由此可见,汉语所具有的“关系名词 > 后置词”这种语法化模式反映的不是汉语语法化的特性,而是表现了人类语言关系名词语法化模式的一种类型特征。

二 伴随介词的语法化模式

很多语言里伴随格功能和工具(以及方式)格功能用同一个语素(附置词或者格词缀)来表达,从而呈现出“伴随-工具(方式)”的“多义模式”(polysemy)。附置词如英语的 with,德

语的 mit, 法语的 avec, 古法语的 ā, 丹麦语的 med, 挪威语的 med, 拉丁语的 cum, 西班牙语语的 con, 土耳其语的 [i]le, 爱沙尼亚语的 ga, 爱斯基摩语的 mik, 佛兰芒语 (Flemish) 的 met, 豪萨语的 da, Baka 语的 tɛ, Ngbaka Ma' Bo 语的 tɛ, 阿尔巴尼亚语的 me, Mezquital Otomi 语的 ko, 格后缀如盖丘亚语 (Quechua) 的 -waeng, Yagua 语的 -ta, 匈牙利语的 -vel。(参看 Nilsen, 1973; Heine et al, 1991; Croft, 1990; Heine and Kuteva, 2002) 而历史地看, 上述多义模式实际上是历时演变的产物, 也就是说, 这些语言的伴随格语素曾经发生过“伴随格语素 > 工具格语素 (> 方式格语素)”这样的语法化演变。(参看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Lehmann, 1995 [1982]; Heine et al., 1991; Heine and Reh, 1984; Heine and Kuteva, 2002) 我们也曾证明, 在 SVO 语言中伴随介词最普遍的语法化模式是“伴随介词 > 工具介词 > 方式介词”。(吴福祥, 2003a)

跟上述语言不同, 汉语伴随格语素的多义模式是“伴随 - 并列”, 即同一个语素可以表达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这两种功能, 如普通话和近代汉语的“和”“跟”“同”, 吴语的“搭”[taʔ⁵]、闽语的[kəʔ²]以及平话的“凑”[ts·vu²⁴]等。^④研究表明, 汉语的这种“伴随 - 并列”多义模式实际上是“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这种语法化演变的产物。(参看吴福祥, 2003a)

“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这种语法化模式是不是汉语所独有的呢? 不是。因为在其他语言中我们也发现用同一个语素来表达伴随介词与并列连词这两种功能的现象, 比如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壮侗语和苗瑶语中, 有些语言也用同一个语法成分表达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两种功能。如佤佬语 (王均、郑国乔, 1980) 的 wən⁴, 黎语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 的 u:ŋ², 布努语 (毛宗武, 1982) 的 zəu⁴, 拉珈语 (毛宗武, 1982) 的 kap⁷, 壮语武鸣话 (张均如、梁敏等, 1999) 的 ɬau⁵, 吉卫苗语 (向日征, 1999) 的 ŋaŋ⁴², 拉基语 (李云兵, 2000) 的 haŋ⁴⁴, 村语 (欧阳觉亚, 1998) 的 nam¹, 佯僇语 (薄文泽, 1997) 的 thim¹、sim⁶、ŋim⁶, 炯奈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2) 的 ta⁴⁴。此外, 非洲语言中这种“伴随 - 并列”多义模式也非常普遍。(参看 Givón, 1979; Lord, 1993; Haspelmath, 2002), 正如 Haspelmath (2002) 所指出的, “伴随与并列之间的多义模式在欧洲语言中几乎不存在, 但广泛见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之中。” Lord (1993) 通过跨语言的共时分析, 证明在西非语言特别是 Benue-Kwa 语群诸语言里许多并列连词的来源可以经由伴随介词追溯到伴随动词, 也就是说, 在这些语言里大量的从动词到伴随介词再到并列连词的演变路径可以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参看 Lord, 1993) Haspelmath (2002) 甚至认为“从伴随格语素到并列连词是普遍可见的语法化路径, 就像其他语法化过程一样, 这种语法化过程也是单向性的。”我们 (吴福祥, 2003a) 也曾证明, “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也是 SVO 语言伴随介词的一种常见的语法化模式。

进一步考察表明, 导致伴随介词在 SVO 语言中具有“伴随介词 > 工具介词 > 方式介词”和“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这两种语法化模式的句法动因是“伴随结构”(伴随介词 + 伴随成分)的位置 (是前置于 VP 还是后置于 VP):

如果一个语言的伴随结构前置于谓语动词, 那么该语言的伴随介词最有可能的语法化模式是“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如汉语、非洲的阿乌图语 (Awutu))。反之, 如果一个语言的伴随结构后置于谓语动词, 那么该语言的伴随介词最有可能的语法化模式是“伴随介词 > 工具介词 > 方式介词”(如英语、豪萨语); 当且仅当该语言的伴随结构可以通过“左向移位”(left-dislocating) 前置于谓语动词时它才有可能同时拥有上述两类语法化模式 (如非洲境内的约鲁巴语 (Yoruba)、丰语 (Fon))。(参看吴福祥, 2003a)

可见, 汉语“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这种语法化模式虽然与大多数 SVO 语言伴随介词语法

化模式不相一致,但它体现的并非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特性,而是 SVO 语言中伴随介词语法化模式的一种类型特征。

三 语法词/附着词的演变

在很多语言里,语法词(grammatical words)或附着词(clitics)可以进一步演变为屈折词缀(inflexional affixes)。比如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7) 和 Traugott (1995) 基于跨语言的考察提出下面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化斜坡(cline):

(6) 实义词 > 语法词 > 附着词 > 屈折词缀

这就是说,在这些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词常常会经历一个“形态化”(morphologicalization)过程(即语法词或附着词变成屈折词缀的过程)。

而在汉语中,语法词或附着词通常不是进一步演变成屈折词缀,而是跟毗邻的词项融合成一个新的词汇项,原来的语法词或附着词成为新词项的“词内成分”(intra-word component)。换言之,汉语的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演变是“词汇化”(lexicalization)而非形态化。即:

(7) 实义词 > 语法词/附着词 > 词内成分^⑤

比如双音词“可恶”、“可爱”、“可观”、“可怜”等历史上是由动词性短语“助动词‘可’+动词”词汇化而来的;“相好”、“相识”、“相继”来自动词短语“交互代词(reciprocal pronoun)‘相’+动词”的词汇化;“所有”、“所在”、“所谓”则源于名词性短语“名词化标记‘所’+动词”的词汇化。(参看董秀芳,2002)。例如:

(8) 形容词“可爱”<助动词“可”+动词“爱”(董秀芳,2002:267):

- a.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左传·襄公 31 年》)(“可爱”为动词性短语,义为“值得爱慕”;“可”为助动词)
- b. 然今水中有此物,一节长数寸,细茸如丝,圆绕可爱(《颜氏家训·书证》)(“可爱”为形容词,义为“让人喜欢的”;“可”为词内成分)

(9) 动词“相好”<交互代词“相”+动词“好”(董秀芳,2002:238-42)

- a.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诗·小雅·斯干》)(“相好”为动词性短语,义为“彼此友善”;“相”为交互代词)
- b. 五衢之民,男女相好。(《管子·轻重》)(“相好”特指男女恋爱,“相”为词内成分)

(10) 形容词“所有”<名词化标记“所”+动词“有”(董秀芳,2002:220-21):

- a.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下》)(“所有”为名词性短语,义为“所拥有的”;“所”为名词化标记)
- b. 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乌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者,并勒还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有”为指代性形容词,义为“全部”;“所”为词内成分)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汉语几乎所有类别的语法词或附着词都有这种词汇化倾向,以下是我们搜集到的部分实例(具体例句从略)。

(11) a. 助动词:

可 X:可恶/可爱/可观/可怜/可取/可能(董秀芳,2002)

X 要:莫要/别要/休要(刘坚等,1992)

当 X/X 当:当然/理当/本当

b. 副词:

X 也:莫也/倒也/可也

只 X:只要/只有/只得/只顾/只管/只好/只消

不 X: 不仅/不过/不必/不曾/不但

非 X: 非但/非惟/非徒/非常

甚 X: 甚至(方一新, 2004)

特 X: 特别/特此

X 复: 虽复/况复/始复/已复/忽复/且复/亦复(王云路, 1999; 杨荣祥, 2003)

再 X: 再也/再说/再见

c. 代词:

X 其: 尤其/极其(杨荣祥, 2003)

自 X: 自爱/自傲/自白/自卑/自便/自残/自沉/自称/自大/自得/自动/自发/自费

相 X: 相信/相继/相好/相识(董秀芳, 2002)

X 然: 果然/当然/必然/虽然(董秀芳, 2002)/诚然/自然/显然/不然

d. 连词

X 而/而 X: 幸而/继而/反而/因而/甚而/进而/既而/而后/而今/而况

以 X: 以前/以后/以南/以北/以上/以下/以内/以外/以来/以致/以至/以便/以免

既 X: 既然/既是

e. 介词

X 于: 由于/对于/关于/至于/终于/善于/等于/敢于/甘于/归于/过于/基于

X 在: 好在/留在/正在

X 乎: 似乎/几乎(杨荣祥, 2003)

X 以: 难以/得以/给以/加以/借以/可以/足以/致以

因 X: 因此/因而

f. 系词:

是 X: 是我/是你(是汝)/是他(是渠)/是底/是谁(刘坚等, 1992; 吴福祥, 1996)

X 是: 只是/也是/还是/或是/但是/可是/要是/既是/若是/总是/倒是

X 为: 最为/较为/尤为/大为

g. 量词

X 个: 这个(=这)/那个(=那)/哪(那)个(=谁)/谁个(谁)

h. 体助词或准体助词:

X 着: 借着/本着/奔着/趁着/仗着/随着/就着/凭着/当着/为着/靠着(董秀芳, 2003)

X 了: 为了/对了/算了/好了(董秀芳, 2003)/除了/因了

X 得: 认得/懂得/晓得/记得/觉得/亏得/免得/省得/显得

X 却: 冷却/了却/失却/忘却/谢却

i. 结构助词

之 X: 之后/之前

所 X: 所有/所在/所以/所谓(董秀芳, 2002)

X 者: 作者/读者/学者/记者(董秀芳, 2002)

X 地: 特地/暗地/忽地/霍地/蓦地/恁地/倏地/暗地/密地/怎地

X 的: 这的/那的/怎的/甚的/甚麽的/也似的/似的/有的

上面的清单中,某些词项的产生方式容有不同看法。比如太田辰夫(1958)就认为频率副词“再也”是由副词“再”加上后缀“也”构成的,推论连词“既是”是由古汉语的推论连词“既”加上后缀“是”构成的。换言之,按照太田先生的观点,双音词“再也”“既是”是通过派生这种构词法产生的。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对概念需要辨析清楚。一是构词(word formation)与词汇化。构词和词汇化是语言中新词(这里主要指复音词)产生的两种主要途径,前者是利用特定的语法规则创造新词,即依据某种构词规则将语言系统中业已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成新的词汇项;后者指一个非词汇的语言成分(这里主要指句法结构式或词汇序列)演变成一个独立的词汇项的过程。^⑥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新词产生途径的性质大不相同:构词过程可以类推并具有高度的能产性;但是,用这种方法创造的新词,本身不含有任何演变的过程,而且也没有一个特定的结构式作为该新词项的词源。比如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名词性或形容词性的自由语素可以附加后缀“-化”而派生出一个新的动词,如: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专业化、商品化、概念化、大众化、企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深化、细化、美化、丑化、淡化、简化、僵化、老化。这个构词规则是可以类推的,并具有不断构造新词的能力。但在“现代化”、“淡化”这类新词“X-化”产生之前汉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作为其词源的句法结构式“X+化”,也就是说,复音词“X-化”并不是由一个对应的句法结构式“X+化”演变而来的;“X-化”只是利用语言中现存的自由语素X和附着语素“化”按照派生这种构造规则创造出来的。与构词过程不同,词汇化过程不具有类推性和能产性,但它却包含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并且总是以特定的句法结构式或词汇序列作为新词项的语源。比如双音副词“还是”是由句法结构式“还+是NP”中的非直接成分副词“还”和系词“是”融合而来的。例如(引自太田辰夫,1958:259):

- (12) a. 还是昂藏一老夫。(李颀诗) b. 王郎还是回家。(顾夐诗)

但“副词‘还’+是NP/VP>副词‘还是’+VP”这种词汇产生过程并不具有类推性和能产性,我们有“还是”、“只是”这样的双音副词,但并没有“又是”、“再是”这样的双音副词。

总之,我们认为构词和词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词汇产生过程。前者是由规则驱动的、可类推的、作用于语言聚合轴的规律性(regular)过程;后者是由演变驱动的、不可类推的、作用于语言组合轴的特异性(idiosyncratic)过程。

另外一对需要辨析的概念是词内成分和词缀(affixes)。很多学者将上面的“X然”、“X是”、“X复”中的“然”、“是”、“复”分析为词缀。比如太田辰夫(1958:248)就把“果然、自然”中的“然”,“极其、尤其”中的“其”,“还是、只是、也是、总是”中的“是”,“幸而”中的“而”看作后缀。我们知道,语言中的词缀有屈折词缀(inflexional affixes)和派生词缀(derivational affixes)两类。这两类词缀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或功能,而且它们与词干或词根之间的组合大多是透明的,通常可以通过音段切分而加以离析。二者的相异之处是,屈折词缀附着在一个词干上表示该词干在性、数、格、时、体、情态、语气等语法范畴方面的行为和属性,但它不改变所附词干的概念意义和语法类别。如“walked”中的-ed表示“walk(走)”的过去时范畴,但它并没有改变“walk”这个动词的语法类别和概念意义。派生词缀附着在一个词根上给该词根带来新的语义成分,它可以(但并不总是)改变所附词干的语法类别。如英语“read(‘读’,动词)+后缀“-er”>“reader(‘读者’,名词)”;又如“duck(‘鸭’)+“-ling(‘幼小的’)”>“duckling(‘幼鸭’)”。那么“X然”、“X是”、“X复”中的“然”、“是”、“复”是什么样的“词缀”呢?首先,它们肯定不是屈折词缀,因为它们并没有表达X在某种语法范畴方面的行为和属性。其次,它们也很难说是派生词缀,因为“X然”“X是”“X复”的“然”“是”“复”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给X带来新的语义成分。事实上我们上面所举的通过词汇化而得到的复音词,其中很多原本属于语法词或附着词的成分在新的词汇项里已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变成不表达任何语义或功能的音段成分,比如“为了(=为)”中的“了”、“X要(=X)”中的“要”、“X

着(=X)”中的“着”(参看董秀芳,2003)、“X也”中的“也”、“X复”中的“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董秀芳(2003、2004)的意见,将“X着”、“X是”、“X然”中的“着”、“是”、“然”以及其他由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Xn/nX”中的“n”(n表示来自语法词或附着词的成分)看作词内成分。词内成分可以是具有某种概念意义或语法功能的词内语素,比如上举“可X、只X、不X、非X、特X、自X、相X”中的“可、只、不、非、特、自、相”;也可以是不具有任何概念意义或语法功能的非语素成分(音段成分),如“X要、X也、X复、X然、X而、X乎、是X/X是、X为、X着”中的“要、也、复、然、而、乎、是、为、着”。

现在回到本文的正题上来。上面提到的“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这种语法化模式其实也非汉语所独有。在其他语言(特别是与汉语结构类型相近的语言)里,同样存在类似的演变。如在我国某些壮侗语和苗瑶语里,对应于汉语“互相”的交互代词跟毗邻的动词所构成的句法组合也往往词汇化为一个新的“交互动词”(reciprocal verb),原来的交互代词变成这个交互动词的一个词内语素,情形与(9)所示的汉语交互代词的演变模式完全平行。例如:

- (13) a. 莫语(杨通银,2000): $tu\eta^2$ ‘互相’+动词 du^6 ‘见’> $to\eta^2$ ($<tu\eta^2$) du^6 (‘相见’)
 b. 侬语(李旭练,1999):动词 $qhan^6$ ‘骂’+ $pj\phi^4$ ‘互相’> $qhan^6pj\phi^4$ (‘吵架’)
 c. 标话(梁敏、张均如,2002):动词 $p\phi\eta^3$ ‘打’+ ken^1 ‘互相’> $p\phi\eta^3ken^1$ (‘打架’)
 d. 临高语(梁敏、张均如,1997):动词 am^3 ‘遇’+ $k\phi n^2$ ‘互相’> $am^3k\phi n^2$ (‘相遇’)

而在另外一些壮侗语里,这种词汇化程度似乎更高,原来的交互代词在词汇化以后所产生的交互动词里与动词性语素似乎结合得更加紧密。比如:

- (14) a. 壮语(王均等,1984): to^4dei^1 (词头 to^4 -‘相互’+谓词性词素‘好’)(‘相好’)
 b. 布依语(王均等,1984): $tu\eta^4za:\eta^6$ (前加成分 $tu\eta^4$ ‘相’+‘接’)(‘连接’)
 c. 傣语(王均等,1984): lai^6kan^6 (词素‘换’+后加成分 Kan^1 (kan^6)‘相’)(‘交换’)
 d. 侗语(王均等,1984): $ta\eta^1t\phi u^6$ (词头 $ta\eta^1$ ‘相’+动词语素‘合’)(‘和睦’)
 e. 水语(王均等,1984): $tu^3a:u^1$ (词头‘相’+‘要’)(‘结婚’)
 f. 毛难语(王均等,1984): $tu^3p\phi\eta^1$ (词头+动词词素)(‘相帮、互助’)
 g. 仫佬语(王均等,1984): $tja:\eta^1p\phi\eta^1$ (词头+动词词素)(‘相帮、互助’)⑦

上面的例子中,表示交互意义的词内语素在王均等(1984)里均被分析为派生词缀(“词头”/“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相应地,包含这些“交互”义语素的交互动词被视为是通过构词过程而产生的。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义语素是否派生词缀姑且不论,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上举交互动词应该是由“交互代词+谓词”的句法组合词汇化而来的。我们的一个主要证据是,在某些同样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里,交互代词与谓词之间的组合还处于一种典型的句法关系,换言之,在这些语言里,交互代词和毗邻的谓词之间尚未词汇化。比如李云兵(2000:110)提到,“拉基语的动词可以在其后加 $kja\eta^{44}$ 表示互动行为”,他举的例子有:

- (15) a. $ta\eta^{44} qei^{55} tei^{55} \eta i^{55} \eta ua^{55} kja\eta^{44}$ 我们大家互相帮助。
 大家 我们 帮助 互相

同样,在黎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

- b. $fa^1 ran^2 gu\eta^7 ba\eta^3 tho:\eta^3$ 我们经常互相帮忙。(王均等,1984)
 我们 经常 帮 互相

假如上引文献的作者对相关语言事实所作的观察和描写可以信据,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将(13)、(14)、(15)看作壮侗语交互代词词汇化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15)所示的拉基语和黎语代表的是未变阶段,在这些语言里 $kja\eta^{44}/tho:\eta^3$ 还是一个独立的交互代词;(13)所示的莫语

等语言体现的是始变阶段,这些语言里的交互代词已跟毗邻的谓词融合成一个新的谓词;而(14)所示的壮语等语言体现的则是进一步的演变,这些语言里,由交互代词演变而来的“交互”义词内语素与谓词性语素之间的“粘聚性”(cohesion)更高。跟语法化一样,词汇化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的演变阶段显示出不同的词汇化程度。我们也许可以说,壮语等语言里交互动词的词汇化程度高于莫语等语言,但我们似乎没有多少证据断言壮语等语言里包含“交互”义语素的交互动词是构词的产物。

另外一个例子是壮侗语和苗瑶语中指人量词(相当于汉语的“个/位”)的演变模式。很多壮侗语和苗瑶语里指人疑问代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谁”和汉语某些南方方言的“哪个”)是由表示抉择的疑问代词(相当于汉语的“哪”)和指人量词构成的。^⑧例如:

- (16) a. 临高语(梁敏、张均如,1997):疑问代词 $l\dot{a}u^2$ ‘哪’ + 量词 na^3 ‘位’ > $l\dot{a}u^2 na^3$ (‘谁’)
 b. 仡佬语(张济民,1993):量词 hen^{33} ‘位’ + 疑问代词 na^{21} ‘哪/何’ > $hen^{33} na^{21}$ (‘谁’)
 c. 莫语(杨通银,2000):量词 ai^3 ‘个’ + 疑问代词 nau^1 ‘哪’ > $ai^3 nau^1$ (‘谁’)
 d. 木佬语(薄文泽,2003):量词 xe^{31} ‘个’ + 疑问代词 $nu\eta^{53}$ ‘哪’ > $xe^{31} nu\eta^{53}$ (‘谁’)
 e. 水语(王均等,1984):量词 ai^3 ‘位’ + 疑问代词 nu^1 ‘哪’ > $ai^3 nu^1$ ‘谁’
 f. 毛难语(王均等,1984):量词 ai^3 ‘位/个’ + 疑问代词 nau^1 ‘哪’ > $ai^3 nau^1$ (‘谁’)

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壮侗语里指人疑问代词的来源,如喻翠容(1980)提到,布依语里指人疑问代词除 dau^1 ‘谁’外,还有由指人量词 pu^4 ‘个’、 $va\eta^6$ ‘个’与疑问代词 lau^2 ‘哪’组合而成的 $pu^4 lau^2$ 、 $va\eta^6 lau^2$ (‘谁、哪个’);韦庆稳、覃国生(1980)说得更明确:壮语的指人疑问代词 $pjau^2$ ‘谁’是由指人量词 pou^4 ‘位’和疑问代词 lau^2 ‘哪’合音而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上举壮侗语的指人疑问代词历史上应该源于句法结构式“指人量词 + 表抉择的疑问代词”的词汇化,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原来的指人量词进一步语法化为指人疑问代词的词内语素。

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汉语(包括前举壮侗语)语法词或附着词的演变模式为什么不符合 Hopper and Traugott(1993)所概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化斜坡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汉语在形态类型上属于分析-孤立型语言,“在这样的语言里语法化不可能造成屈折形态成分的产生”(Traugott and Heine,1991)。可见,导致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词汇化而非形态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汉语的形态类型特征(即汉语是缺少屈折形态系统的分析型语言)。^⑨

四 结语

本文考察了汉语语法化演变中三个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语法化模式或路径,即(i)“关系名词 > 后置词”、(ii)“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和(iii)“语法词/附着词 > 词内成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三个语法化模式或路径的产生跟汉语的结构类型密切相关。具体说,“关系名词 > 后置词”、“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这两种语法化模式决定于汉语的“局部类型学”(partial typology)特征:在领属结构式语序这个句法参项上,汉语属于“领属语 + 核心语(关系名词)”型语言,因此由用作核心语的关系名词语法化而来的附置词自然是后置词;另一方面,在伴随结构语序这个句法参项上,汉语属于伴随结构前置型语言(即“[主语名词] + [伴随介词 + 伴随成分] + 谓语动词”),因此由伴随介词语法化而来的语法成分最有可能是并列连词。而“语法词/附着词 > 词内成分”的语法化模式则导源于汉语的“整体类型学”(holistic typology)特征:汉语在形态类型上属于分析-孤立型语言,这种形态类型的语言通常不会发生“语法词/附着词 > 屈折词缀”这一形态化过程,因此汉语的语法词/附着词的进一步演变只能选择“语

法词/附着词 > 词内成分”这样的语法化模式。

假若本文的讨论能够成立,可由此导出的一个结论是,尽管一个语言的语法化模式的类型变异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诱因,但是这个语言的结构类型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所体现的类型变异与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应该具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或路径的类型变异与共性特征也并非完全对立。事实上,本文讨论的汉语语法化模式或路径所显示的类型特征,如果加上若干条件,似乎也可概括为下面的统计性蕴含共性:

- (i) 在小句语序为 SVO 而领属结构为“领属语 + 关系名词”的语言里,如果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那么该附置词通常是后置词(如汉语、埃维语)。
- (ii) 在小句语序为 SVO 而伴随成分前置于 VP 的语言里,如果伴随介词发生语法化,那么其输出端最有可能是并列连词(如汉语、非洲诸语言、若干壮侗语)。
- (iii) 如果一种语言是缺乏屈折形态系统的分析性语言,那么该语言的语法化过程不大可能导致屈折词缀的出现(如汉语以及其他分析性语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汉语语法化演变模式所观察到的上述三个类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跨语言的语法化共性仍是相通的。

附 注

① 关系名词 (relational noun) 指用来表达与另一个名词相关的方向、位置等语义概念的名词,如英语的 top、back;此外,人体部位名词也具有关系意义,因而也属关系名词,如英语的 foot、head。关系名词通常要求一个特定的领属语与之共现,并用作领属结构式中的核心语。如英语的“at the top of NP”、“on the back of NP”。参看 Lehmann(1995[1982]、1985、1986) 和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② 附置词 (adpositions) 是前置词 (prepositions) 和后置词 (postpositions) 的总称。

③ 框式附置词 (circumpositions) 指在一个题元成分的前后同时使用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表达式,如 Pashto 语的 pa kor kše(在房子里)。参看 Greenberg(1995) 和刘丹青(2003)。

④ 在南方方言里,伴随介词还有其他多义模式。比如在部分吴语、闽南方言以及某些客家话里伴随介词可以用作处置式中的介词(参看 Chappell, 1994)。

⑤ 这里所说的“语法词”(grammatical words),既包括传统上的虚词小类(如副词、介词、连词),也含助动词、代词、系词和量词;而“附着词”(clitics)则主要指结构助词和体助词。即:

语法词:助动词/代词/系词/副词/介词/连词/量词 附着词:体助词/结构助词

按照某些语言学家的界定,语法词在音系和句法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通常具有完整(full)的音段结构(segmental structure),有些语法词还可以有完整的韵律结构(比如可以念重音)。(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附着词则是一种语法行为介于语法词和词缀之间的语素形式。典型的附着词具有完整的音系形式但不能重读,它必须出现在句子里的特定位置,在句法和音系上依附于其宿主(host)之上。(Zwicky, 1985;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根据上述标准,汉语的体助词(“着”、“了”)和结构助词(“的”、“地”、“得”)显然是附着词,因为它们必须出现在句子里特定的位置上,而且在句法和音系上依附于其前的谓词(即句法和音系上缺少独立性)。另一方面,体助词(“了”、“着”)和结构助词(“的”、“地”、“得”)总是念轻声,而且元音弱化;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完整的音段结构和韵律结构。

⑥ “词汇化”在一般语言学文献里所指并不一致。按照现时多数语言学家的意见,词汇化指的是一个非词汇的语言成分(如音系成分、语义项、句法成分、形态成分以及语用成分)演变为词汇成分的过程,而狭义的词汇化只指语法成分(形态标记、虚词以及结构式)演变为实义词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词汇化主要指包含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句法结构式或非直接成分的词汇序列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实义词的过程。

当然,派生词缀“化”的产生应该跟某个特定的词汇化过程相关,换句话说,词缀“化”很可能最初源于句法组合“X+化”(比如“蜕化”)的词汇化。当“化”变成常见的派生词缀后,人们就可以将它当成现成的语素用来跟相关的名词或形容词结合构成新的词汇项(构词)。从这个意义上说,词汇化过程跟构词过程并非毫不关涉。感谢《中国语文》的审稿人提醒笔者注意到这个现象。但另一方面,具体到某个特定词汇项,其产生过程要么属于词汇化,要么属于构词现象。比如在汉语里双音词“X化”可能有词汇化和构词两种形成过程,但像“现代化”“淡化”这类复音词只会是构词的产物,因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现代·化”、“淡·化”这样的句法组合。

⑦ 这些例子里的一些术语(如“词头”“词素”“语素”)沿用原书的表述形式。

例(13)、(14)、(15)所示的三种情形也许跟原描写者在定名和连词拼写方面的处理不同有关,并不一定反映交互义语素和相关动词之间结合程度的差别。如果确是这样,那么这三个例子并不能显示交互义语素词汇化程度的差异。感谢《中国语文》的审稿人指出这一点。不过,我们这里主要是论证这些壮侗语和苗瑶语交互动词是来源于由交互代词参与的词汇化过程,而不是来源于构词过程。因此,即使对例(13)~(15)的词汇化程度差别的观察不尽准确也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⑧ 在某些苗瑶语里,指人疑问代词也可以由指人量词和其他疑问代词融合而成。比如炯奈语(毛宗武、李云兵,2002)里指人疑问代词是由指人量词 $laŋ^{44}$ (‘个’) + 疑问代词 na^{53} (‘谁’) 构成的: $laŋ^{44} na^{53}$ (哪个/谁) (< $laŋ^{44}$ (‘个’) + na^{53} (‘谁’)); 而在苗语里指人疑问代词 $te^{11} qei^{55} ci^{35}$ (或 $te^{11} ci^{35}$) (‘谁’) 则是由指人量词 te^{11} (‘个’) + 疑问代词 $qei^{55} ci^{35}$ (或 ci^{35}) (‘什么’) 组成(参看王辅世,1985)。

⑨ 在某些形态较发达的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词也可以进一步演变为词内成分。比如英语的 tomorrow (明天)是由中古英语的介词结构“to + morrow(次日)”词汇化而来的;twit(嘲笑)则来自古代英语的结构式“æt-witan ‘at + blame’”。(参看吴福祥,2003b)但这个事实并不构成本文基本结论的反例,因为我们要证明的是,孤立-分析型语言由于受结构类型的制约,其语法词或附着词如果进一步语法化,通常只能演变为词内成分;至于屈折型语言,由于没有结构类型的制约,其语法词或附着词既可以演变为屈折词缀,也可以演变为词内成分。所以就本文的基本结论而言,真正的反例应是这样的情形:形态发达的屈折型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词可以变为词内语素但不能变为屈折词缀;反之,孤立-分析型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词可以变为屈折词缀但不能变为词内语素。

参考文献

- 薄文泽 1997 《佯瓯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03 《木佬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 2003 《论“X着”的词汇化》,《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
—— 2004 《“是”的进一步语法化:由虚词到词内成分》,《当代语言学》第1期。
方一新 2004 《中古词义演变的几种类型》(未刊稿)
李旭练 1999 《侬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李云兵 2000 《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梁 敏 张均如 1997 《临高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02 《标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刘丹青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刘 坚 江蓝生 白维国 曹广顺 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毛宗武等 1982 《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毛宗武 李云兵 2002 《炯奈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欧阳觉亚 1998 《村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欧阳觉亚 郑贻青 1980 《黎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太田辰夫 1958 《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 王 均 郑国乔 1980 《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王辅世 1985 《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王云路 1999 《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中国语文》第 5 期。
- 韦庆稳 覃国生 1980 《壮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吴福祥 1996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
- 2003a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2003b 《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向日征 1999 《吉卫苗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杨通银 2000 《莫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杨荣祥 2003 《副词词尾源流考察》,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 喻翠容 1980 《布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
- 张均如 梁敏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 Aristar, Anthony R. 1991 On diachronic sources and synchronic patter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linguistic universals. *Language* 67. 1: 1 – 33.
- Bybee, Joan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988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 in explanation. In J. A. Hawkins (eds.).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350 – 7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7 Semantic aspects of morphological typology. In Joan Bybee, John Haiman,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003a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grammaticalization. To appear in: Richard Janda & Brian Joseph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2003b Mechanisms of change a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To be translated in Spanish as ‘Los mecanismos del cambio como universales lingüísticos’. To appear in R. Mairal and J. Gil (eds.) *En Torno a los Universales Lingüístic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ppell, Hilary 1994 Comitatives as accusative markers in Sinitic Language: An unusual type of Disposal Construction, CRLAO, CNRS, Paris and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 Croft, William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 Delancey, Scott 199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93 Mid-America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nd Conference on Siouan/Caddoan Languages*, 1 – 22. Boulder: De Gruyter.
-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gradience of categories. In: Joan Bybee, John Haiman,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ivón, Talm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H. 1995 The diachronic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Masayoshi Shibatani & 2005 年 6 期

- Theodora Bynon(e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1997 *Indefinite Pronou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2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 Tomasello(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ume II.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and Mechthild Reh 198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hmann, Christian 1995[198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ich: Lincom Europa.
- 1985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 *Lingua e Stile* 20:303 – 18.
- 1986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General Linguistics* 26:3 – 23.
- Lord, Carol. 1993 *Historical Change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Mallinson, Graham and Barry Blake 1981 *Language typology: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in Syntax*.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Nilsen, D. L. F. 1973 *The Instrumental Case in English*. The Hague: Mouton.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5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a hist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CHL XII, Manchester.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ernd Heine 1991 Introduc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Amsterdam: Benjamins.
- Zwicky, Arnold. 1985 Clitics and particles. *Language* 61:283 – 305.

(吴福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广西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 530004)

江苏省语言学会第 17 届学术年会召开

江苏省语言学会第 17 届学术年会暨纪念段玉裁诞辰 270 周年大会于 2005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江苏省常熟市常熟理工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高校、出版社等的近 150 名语言文字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年会共收到论文 70 多篇,中心议题有:清代著名语言学家、《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的学术功绩、语义、语法、训诂、方言研究、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影响等。这次年会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共济一堂,就语言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前任会长鲍明炜、许惟贤、卞觉非三位教授也参加了年会并作报告。大会还组织了研究生专场,40 多位研究生进行了交流,徐州师大张爱民教授和苏州大学石汝杰教授主持并给予点评。

学会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南京师范大学马景仑教授连任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赵家新)

ZHONGGUO YUWEN

CHINESE LANGUAGE

November, 2005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Wu, Fuxiang, Some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s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orpho-syntactic changes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ree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paths with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of Chinese. It further attempts to present a tent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typological factors of these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paths.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Fang, Mei, On grammatical bleaching of the 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verbs: from 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s to pragmatic markers

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verbs (E/E verbs) are used in various ways grammatically in colloquial discourses, and lots of them are far beyond 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s (CTPs) us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core function of this kind of verbs in written contexts. In this paper, a variety of E/E verbs are re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mmatical de-categorization and semantic bleaching, and described in the process of a shift from lexical items to pragmatic markers. This shift is speaker-oriented and always expresses speaker's viewpoint on the assertion conveyed by the grammatical complement.

Key words: 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verbs, 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s, bleaching, pragmatic markers, grammatical control, subjectivity

Song, Wenhui, Subjectivity and volition of agents

Through comparing the Chinese kernel sentences, *Ba* Construction and *Bei*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ototypicality of agents is relevant not only to objective aspects of semantics, but also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factors can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volition of agents and affect the grammaticality of *Ba* Construction and *Bei* Construction.

Keywords: agents, subjectivity; volition, kernel sentences, *Ba* Construction, *Bei* Construction

Ding, Jiayong, The semantic roles of subject i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the Longhui Xiang dialect: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in valency

Chi-sentence is a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the Longhui Xiang dialect, and its semantic roles in the subject position are very complicated. It shows that semantic roles of verbs disagree with the arguments of a sentence in question. The semantic role in subject position of *Chi*-sentence can not be merely generalized as such verbal arguments as patient, obligatory arguments or proto-patient. It should be generalized as an affected argu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sentence argu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and the ICM of verbs. The facts of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this dialect